

# 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國際關係理論—— 一種比較的觀點

曾怡仁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吳政嶸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 摘要

密特蘭尼對個人價值以及人文關懷的強調是其功能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而非一般所認為的只是一種區域整合的理論。本文主要目的就是完整地重新思考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首先、探討其功能主義的主要內涵、目標和方法論；其次、比較分析功能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中的學術立場，從中釐清其與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異同，並檢討功能主義對戰後科學主義研究方法以及新功能主義批評之回應；最後、評價功能主義在當今國際關係研究中所可能具有的啟示。

**關鍵字：**大衛·密特蘭尼、功能主義、國際社會、區域整合、國際關係理論

## 壹、前言

歐盟作為一種跨國合作的模式，其整合進程給予人們極大的期待，希望能夠超脫無政府國際社會的衝突宿命，而國內在研究未來兩岸關係的可能前景時，也常援引歐盟的經驗來作類比思考。歐洲的整合過程當然會引起學者的關注，並提出各式各樣的研究途徑來加以掌握，其中密特蘭尼 (David Mitrany) 的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可說是最早，亦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論。功能主義在戰後的區域主義或國際關係研究當中不斷被提及，其影響力之大至今依然可見，美國學者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就認為，功能主義是 20 世紀第一個以超越國家主權觀來談論合作問題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 (Keohane, 1978: 805-806)。

一般人在討論功能主義時常將其視為一種著重經濟層面的區域整合理論，並且以其「分枝論」 (doctrine of ramification) 作為切入點，認為國家之間某一 (經濟或技術) 功能部門之成功合作，會觸發另一部門合作之需要，構成國家間的互賴網，並逐漸擴張到政治部門，終至完成政治整合的目標。然而，密特蘭尼談論國家間的功能性合作，是從「人類需要」 (human needs) 的滿足和「公共福利」 (public welfare) 的提昇作為出發點。此外，功能主義也強調人們經由相互學習與社會化的過程，可以超越對原先國家的政治認同，形成一個人類基本需要都能獲得滿足的和諧「世界社會」 (world society)。可見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價值不限於所謂的「分枝效果」或經濟區域整合，而是有更多的人文關懷和對人類前途的樂觀期待。

本文目的就是試圖較完整地理解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國關理論，以文獻分析和比較研究法進行討論，主要參考其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1933)、*A Working Peace System* (1966)、以及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1975) 等代表性著作，以及其他學者對其功能主義的評論文章。此外，本文也依照國關理論的發展時序，將功能主義和理想主義、現實主義、科學主義以及新功能主義進行比較，如此可以更清楚密特蘭尼

國關理論的立場與特色。除了前言外，本文總共分爲六節，第二節介紹密特蘭尼的思想背景、淵源與目標，以對功能主義的內涵有初步的掌握，這有助於之後和其他理論學說作比較。第三節比較二次戰前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與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義以及卡爾（Edward H. Carr）的現實主義之間的異同，本文認爲不能將功能主義和理想主義簡單地畫上等號，和現實主義的主張也非格格不入。第四節說明二次戰後行爲主義學者對功能主義缺乏預測性的批評，以及密特蘭尼對社會科學研究走上所謂「科學化」的憂心態度。第五節介紹哈斯（Ernst Haas）新功能主義對功能主義的修正，以及密特蘭尼和後繼者的回應。事實上，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存在許多研究概念與方法上的不同，而不僅在於整合過程中是否考慮政治因素的作用。最後的結論則是提出，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除了區域整合外，對當今國際關係研究仍具有的重要意義與可能的啓示。

## 貳、功能主義的主要內涵

### 一、思想背景

密特蘭尼生於西元 1888 年的羅馬尼亞，1912 年前往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就讀，主要是研習社會學，之後往返於英、美兩國間（政府部門）工作或教學，於 1975 年逝世。生平所處的國際環境、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當時英國的思潮決定了其功能主義的內涵，這些思想背景主要包括民族主義、科技與國際組織的進展等三個面向。

20 世紀可以說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世紀，許多國家因之而分裂，或因之而創建。民族主義在當時成爲人民忠誠認同的新對象，民族自決的主張在第三世界國家更是風起雲湧，形成一連串的獨立解放運動。相對地，當殖民列強無法抑制民族主義情緒時，也會利用族群間的衝突矛盾，從中獲取利益（Mitrany, 1975: 89）。對密特蘭尼來說，此造成了民族主義和

國家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嚴重妨礙了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的建構可能性，導致國與國之間常見的衝突或戰爭（Mitrany, 1975: 138）。密特蘭尼認為必須區分民族性（nationality）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19世紀之前國家的創建過程往往是先有民族性的基本要素，如共同的風俗習慣、語言、歷史經驗以及統一的自覺等，爾後才有國家的成立。殖民帝國崩解以後，在新興獨立國家中這些基本構成要素往往都是不足的，如此建立的國家就失去了堅實的基礎。不過，民族性本身並不帶有排他性，此概念相當於個人的人格特質，不必然就會侵犯他人，但後來卻不幸地演變成民族主義，並以此作為排他的正當性論述，這是造成國際間衝突的問題所在。未來國際組織的發展必須能夠讓各族群享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時也顧慮到他們的物質需求（Mitrany, 1975: 144-45）。

此外，科技的進步造就了當時國際議題內容的變化，使得政治、經濟和更多其他的議題，如飛行航道的安排和廣播頻率的使用等，不論是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都得共同面對，國家既然無法獨力解決，那麼就應該設立國際組織來合作處理（Mitrany, 1966: 70-71）。密特蘭尼認為，隨著科技所帶來交往機會的增加，跨國界互動不論是官方或非官方的，都會在國家間產生一定程度的合作和衝突。也因此，國家的決策不再單純地只是一國的內部事務，這使國內與國際的分野模糊了，國際關係來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而國家也承受著前所未見的內外雙重壓力。（Hammarlund, 2005: 41）。簡言之，科技的發展一方面可能是國家追求其目標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卻也可能限制國家的作為範疇。

最後，對密特蘭尼而言，當主權國家和舊有的國際組織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時，就必須創設新的功能性國際組織以為回應，國家與個人在此跨國際的交往過程中逐漸擴大合作的層次和範圍，即功能主義下的「分枝效應」。事實上在人類第一個世界性國際政治組織－國際聯盟出現前，國際組織大都是功能性質的，如 1865 年的國際電報聯盟、1874 年的郵電總聯

盟以及 1875 年的國際度量衡組織等<sup>1</sup>。19 世紀國際組織的成員國基本上是以歐美少數發達國家為主，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進步，20 世紀前半葉跨越國界來處理問題的國際組織，在數量和功能範圍上更是不斷地增加，幾乎涵蓋了世界所有的國家，形成國際組織網絡，這正顯示國家體系下新秩序的開展，以及人們認同對象正在發生變遷（Taylor, 1983: xi）<sup>2</sup>。

## 二、思想方法

影響密特蘭尼學術思想的源流，主要來自於其在英國所受的教育，同時也受到當時國際和平運動以及左派費邊社主義（Fabianism）、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以及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等思想的影響，樂觀地期待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的出現，以及尋求人類的集體解放。密特蘭尼重視哲學、歷史與法律規範的研究，也不會死守任何的教條理論，如果從其著作中做歸納，主要有進步史觀、多元主義、實用主義以及層次類比（level analogy）等四項基本的思想方法。

理解密特蘭尼功能主義的關鍵在於其進步史觀（history of progress），這主要表現在其對主權國家和國際關係的態度上。密特蘭尼對於主權國家的演變，所持的是典型的神權、君權、爾後民權的線性史觀（Eastby, 1985: 14）。原先束縛個人需求實現的那些舊有政治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後來更高、更不具排他性或更具包容性的適應形式所取代。然而，當今人們卻似乎停留在以主權國家為最重要且不可取代的政治形式，這是令他疑惑不解的，其甚至視國家的主權問題為「基本敵人」（basic enemy），需盡力加以克服（Rosamond, 2000: 33）。對其而言，人們應該有能力尋求超越主權國家這一階段，最後以形成滿足所有人類經濟與社會需要的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而告終（Navari, 1995: 226-31）。這種進步史觀和當今主流

<sup>1</sup> 爲了和國際政治組織相區別，功能性合作組織亦被稱爲「國際行政組織」。

<sup>2</sup> 當然，以國際組織的大量興起作爲人們認同變遷的論證是有爭議的，後來的功能主義學者不再以國際組織的「量」，來作爲功能主義的實踐證明。

(新)現實主義國關理論不同，後者假設國際體系是處於一種永恆的無政府狀態，並且忽略人類改造歷史或社會發展的能動性。

對於國際組織的適當組成形式，功能主義的思考主要是反映多元主義的概念 (Navari, 1995: 218-19)。近代多元主義 (pluralism) 的起源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英國，此概念的出現旨在反駁黑格爾 (Hegel) 式的國家觀，亦即反對一元的 (monistic) 絕對主權觀，認為主權是一種聯合形成的政治權威 (徐火炎, 1976: 241)。循此，密特蘭尼主張國際社會下的個人所組成的各種跨國功能性組織，可依各自的需求以及技術上的可行性，來找到最適當的合作形式。技術上的需要會決定國際合作的形式，也就是所謂的「技術自決」(technical self-determination) 原則，不需要先成立類似世界政府的組織來主導這樣的合作。

除了多元主義之外，密特蘭尼談論功能主義的方式是抱持一種實用主義的觀點<sup>3</sup>，反對抽象性思考，認為功能主義主要是一種瞭解世界和解決個別問題的方法，強調去實踐人類需要 (human needs) 與公共福利 (public welfare) 的滿足，而不一定要去建構完整的理論架構，或預測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他甚至認為寫定的條文有可能阻礙功能性合作的進展，這種態度不僅是受到英國不成文法傳統的影響，也是他對 1930 年代美國實施新政的看法轉移。密特蘭尼推崇新政的實施並沒有明定的條文，也非憑藉某種意識型態，而是為了因應社會的實際需要。新政是一種「政策」而非理論，各種的想法和目的混合其中 (Mitrany, 1933: 161-64)。據此，經由功能性合作所形成的國際社會也不是經由明定的條文規範，而應該是一種動態的自然發展過程。

密特蘭尼另一思想特色就是將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作類比，以國內社

---

<sup>3</sup> 實用主義自 19 世紀開始發展，於 20 世紀的美國成爲一種主流思潮，代表人物有詹姆斯 (William James)、皮爾士 (Charles Sanders Pierce) 和杜威 (John Dewey) 等人，主要論點有：強調知識是控制現實的工具，現實是可以改變的，理論和概念只是了解世界實在 (world reality) 的一種工具，而不是終極答案等。關於實用主義的詳細內容，可以參考詹姆斯 (1981)。

會的發展經驗來思考國際社會的形成可行性。密特蘭尼認為，一國社會內部的主要問題在於，如何讓社群有著經濟與社會上的和諧關係，同時在完善的社會發展計畫下，又不侵犯到其中個別公民的自由權利。他將這樣的理念放到更廣泛的國際社會來看，認為問題在於如何增進各種國際合作的效能，而又不侵犯到各民族的情感和民族性 (Mitrany, 1975: 144)。此外，隨著時代的演進民主國家政府對人民基本權利的承認，代表人民共同制訂法律以規範其權利義務的範圍，並以此為基礎來創造民主社會。相較之下，一般人常誤認為國家與國家間對主權的承認，代表了無更高法律規範的存在。然而對密特蘭尼來說，國家主權概念正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是多元主義者將國家視為個人為了方便追逐利益而成立的組織，本質上和其他的利益團體類似；另一方面則是國際法學者認為，主權概念本身就是一種不成文的國際法。各國主權的平等、主權不受侵犯以及對內有排外的統治權，都是各國對主權概念的共識，在此共識下國家間才可能有正常的交往。也因此，實際上國際社會並非處於極端混亂、征戰連連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是有可能在共識下進行合作 (Mitrany, 1933: 67-70)。

### 三、思想目標

密特蘭尼所身處的時代 (1880 年至 1975 年)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折磨，如何防止戰爭的再度發生是當時人們共同關切的議題。對密特蘭尼來說，防止戰爭的方法大致可分成消極面與積極面兩種分式，前者如透過結盟來嚇阻敵人，然此方法不像是為了和平，反而更像是施壓的手段；而後者則如藉由交往來促進瞭解，進而改變國家間互動的態度，這是功能主義所提倡的和平演變方式 (peaceful change) (Mitrany, 1975: 152)。雖然促進國家間的瞭解和互動並不一定保證戰爭不會發生，但是敵意的產生卻往往出於不瞭解。此外，密特蘭尼認為暴力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來自於人們社會與經濟生存條件的匱乏，因此在人們的基本需要上如果能給予適當且有節制的滿足，是有助於國際和平的 (Taylor, 1990: xi)。

密特蘭尼雖然對絕對排他性的主權觀非常反感，但卻支持增加政府的職能，甚至成立福利國家 (Mitrany, 1975: 93) 以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他認為某種程度的經濟計畫確實比私人企業對經濟問題有更全面性的看法，不僅是追求利潤，同時也能兼顧社會安全與公平正義的價值，這將會受到大眾的支持 (Mitrany, 1975: 207)。值得注意的是，密特蘭尼關注的是人類基本「需要」(needs) 的滿足，而非個人無止境的「欲求」(wants) 或市場交換過程中「需求」(demands) 的滿足。「滿足需要」隱含有福利的概念，是個人行使自由權利的條件，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保證，以及完成自我實現的前提，這是為何密特蘭尼會支持福利國家體制的原因 (Mitrany, 1966: 107)。至於人類基本需要的標準該由誰來界定，就影響密特蘭尼思想的英國費邊主義而言，應該是由專家及技術官僚組織來認定及管理 (張世雄，1996: 99)。密特蘭尼這種對「專家管理」的信任，也表現在國家間功能性合作的過程中。此外，由於對人民需要的回應不會因國家憲政體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如此對於國際關係下政府間的合作，就不應該因對方體制的不同而採取敵視的態度 (Mitrany, 1975: 222)。很明顯地，在這裡密特蘭尼和康德 (Immanuel Kant)「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 的主張不同，後者認為實行類似的共和體制國家間才有可能進行合作 (Kant, 1957: 100)。

從個人需要 (needs) 的滿足推演至國家間合作與國際和平，功能主義最後又回到個人認同 (identity) 的問題上。密特蘭尼認為現代國家有兩個主要任務，一為生活上的需要滿足，亦即追求公民的最大幸福；一為心理上的認同，使其所屬群體產生歸屬感，即將認同投射到一個抽象的共同體—國家之上 (Mitrany, 1966: 45)。物質環境的改善和人們對國家的忠誠是息息相關的，當人民感受不到在民族國家下所能得到的保障時，他們便會將原來對國家的忠誠轉移到對功能性國際組織的認同上。但是功能主義不是烏托邦，並不期待出現一個更高的世界政府來取代現有的主權國家。國家間藉由功能性的合作，將特定任務委託國際組織管理，賦予此機構必要的權力和工具，將部分的主權 (a slice of sovereignty) 從國家轉移至新機構，



這並不是要放棄 (surrender) 主權，而是共享 (share) 主權 (Mitrany, 1966: 31)。由功能性國際組織組成的國際社會，最終將會形成滿足全體人類需要的世界社會。簡言之，對密特蘭尼而言，如何防止戰爭、促進國際合作以及最終形成世界社會，這三階段的目標都必須從滿足個人的基本需要做起。

### 參、功能主義、理想主義及現實主義國關理論的異同

現實主義大師卡爾 (E. H. Carr) 在二次戰前將密特蘭尼納入烏托邦派 (Carr, 1939: 91-95)，後來一般將功能主義歸為理想主義。事實上，功能主義的理論位置並不是單純的處於理想主義一端，也非完全和現實主義互相扞格。

#### 一、功能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異同

1919 年到 1939 年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許多各式各樣的反戰組織和反戰思想，理想主義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理想主義的代表，也是少數能將這股思潮付諸實現的，就非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 (1913-21) 和他的「14 點和平原則」莫屬<sup>4</sup>。威爾遜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是起因於，國家間缺少嫺熟的外交手段和適當的法律措施所引起的不正常狀態，如果能夠藉由人們的理性和法律意識，建立集體安全與國際法，就可以讓國際秩序保持在和平的狀態。除了這些和其他理想主義者共通的觀點外，比較特別的是，威爾遜受康德民主和平論的影響甚深<sup>5</sup>，其相信人們選擇的民主政府會制定進步與和諧的政策，因此國際和平秩序的達成必須建立在民主國家間的友好關係上 (Wilson, 1917)。再加上透過消除貿易障礙，來促進經貿

---

<sup>4</sup> 14 點和平原則其內容包括：廢止秘密外交、海洋自由航行、廢除關稅壁壘、縮小軍備、設立國際和平機構、民族自決原則、公正解決殖民地問題、允許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各民族獨立、建立一個有出海口的獨立波蘭、共同保證大小國家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sup>5</sup> 康德認為理性的個人可以在法律保障下，藉由民主制度保證人民對當權者的約束，因此實行民主共和體制的國家間甚少或不會發生戰爭。

的交流，對於和平會有莫大的助益。

如同理想主義者這一術語並不是當時主張者用來描述自己想法的稱謂，而是後來批評者強加到他們身上的一樣，密特蘭尼也不認為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反而自認為是實用主義者。事實上，密特蘭尼對國際聯盟和威爾遜的 14 點和平原則多所批評。首先，他認為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不在於權力不足，而在於其合作並不是以人民的需求為出發點，仍然沿用以政治利益和主權領土範圍作為考量的傳統思維方式 ( Mitrany, 1975: 103-104 )。其次，密特蘭尼也不認為國際經濟的交流 and 互賴會阻止戰爭的發生，反而可能是衝突產生的根源。他將國際經濟發展視為對國家能力的一種挑戰，單靠市場邏輯並不會使國家間關係變好 ( Hammarlund, 2005: 173 )。最後，密特蘭尼亦對民主是否有利於國際和平持保留態度，認為自由民主國家間的結盟常是一種意識型態的聯盟 ( ideological union ) ( Mitrany, 1966: 46-47 )，將意識型態帶進國際關係是有其危險性 ( Mitrany, 1966: 48 )。況且，民主體制尚可分為採用社會民主式的大有為福利國家與採用自由民主式的放任資本主義國家之別，那麼民主國家間是否要依政府介入市場的程度差別來決定合作與否 ( Mitrany, 1966: 49 )？他同時也非常懷疑西方的民主體制是否能於當時新獨立的國家裡實踐，如此國際和平的前景就非常有限 ( Mitrany, 1975: 212-15 )。

## 二、功能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異同

卡爾是公認的現實主義奠基者，其認為理想主義低估了「權力」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同時高估了國際法和道德原則對國際關係的作用。理想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對特定狀態的辯護和促進，尤其是對大國有益。卡爾認為權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國際政治就是權力政治，戰爭則是國家間展現權力的最高形式 ( Carr, 1939: 100, 102 )。同時卡爾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命題代表的是，無一高於主權國家的國際組織或政府，可以來處理國家間的衝突，這是國際和國內政治最大的不同之處 ( Carr, 1939: 81-91 )。

可以說，對國家主權的強調、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對道德原則的虛幻性批判、和國家利益的基本衝突性等看法，構成了卡爾的現實主義核心內容。

當然，卡爾的現實主義與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之間，存在著許多的差異。例如，密特蘭尼的進步史觀認為人類社會不斷往更好之方向邁進，但對卡爾來說，人類歷史從來就不是連續性的，國際關係是一種在戰爭與和平間的循環反覆（Carr, 1990: 116）。其次，現實主義談國家間合作的唯一可能方式，是基於權力和國家安全考量所達成的國家間聯盟。密特蘭尼則批評這種帶有國家中心主義，以及敵對性和排他性的合作關係，和過去的「世界帝國」沒有什麼不同。密特蘭尼主張，從國家中心論來看待國際關係的態度應該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要從個人的需求出發來進行國際合作（Mitrany, 1966: 178）。最後，卡爾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一個事實的存在，並不會形成所謂的國際社會；密特蘭尼則持相反的看法，認為國際社會的生成發展是有可能的，國際無政府狀態才是一個假設的狀態。

然而，卡爾從來不是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自己就認為所有的現實主義者其實多少都帶有點理想主義的色彩。他曾經說過，國際政治理論不應只是關於國家追求權力的理論，純粹的現實主義（pure realism）除了毫無掩飾地主張追求權力外，對國際秩序毫無建樹（Carr, 1939: 87）。因而，卡爾主張任何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皆必須同時考量理想與現實，以及道德與權力，兩個看似矛盾的面向，並加以適當的平衡，如此國際關係才會是完善和諧的（Carr, 1939: 74）。有趣的是，卡爾理想層面表達出來的觀點，甚至是遣辭用字，與密特蘭尼可說是不謀而合。例如，在其 1942 年《和平的條件》（*Conditions of Peace*）一文中就認為，二次大戰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重建（economic reconstruction），並且應該是建立在「實際的需求」（practical needs）甚於建立在任何已知的理論上（Carr, 1942）。卡爾亦認為藉由新需求的滿足和國際合作等條件，可以把對國家的忠誠冶煉（forge）成對國際組織的新忠誠（new loyalties）（Wilson, 2000: 98），這些見解和密

特蘭尼的主張相當接近。可以說，卡爾的現實主義與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對於國際關係的本質縱然有不同的看法，但兩者對於國際關係的未來確有著類似的樂觀願景。

另一位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 (H. J. Morgenthau) 與密特蘭尼一樣，亦擔憂二次戰後民族主義的再度興起與新科技的發展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前者是一種不理性的現象，會威脅國際和平；而後者使國際關係議題更加複雜多樣，難以處理。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要解決國際關係這些新問題，關鍵就在於從各國同意下產生自願性的利益合作，並創建超國家組織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來加以解決，而功能主義是一個可行的理性方法。摩根索給予功能主義的評價是：文明世界的未來和功能主義下國際組織的發展與否密切相關 (Morgenthau, 1966: 9)。

簡言之，現實主義和功能主義不是那麼對立，而是存在著對話的可能空間。

## 肆、行為主義的批判與密特蘭尼的立場

### 一、傳統主義與科學主義

1950、1960 年代國際關係大辯論是「行為主義」(behaviorism) 與「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 在方法論上的爭辯，是一場關於如何「科學地」研究國際關係的討論 (Vasquez, 1990: 68)。其實，傳統主義與科學主義不是那麼截然二分，要將某一國關學者的研究做歸類並不是那麼容易。卡爾早在 1939 年的《二十年危機》(*Twenty Years' Crisis, 1939*) 一書中就已展現對國際關係「科學化」的要求，他認為國關研究不能悖離事實的真相，將自己所欲 (aspiration) 與事實 (reality) 相混淆 (Vasquez, 1990: 68)。同樣地，摩根索也主張將國際關係理論「科學化」，在 1948 年的《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1948*) 中認為，國關研究應該是具普遍性及理論

性的，並以「權力」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然而，後續國關研究的「科學」走向，卻是卡爾和摩根索所意想不到的，被後輩學者歸類在「傳統主義」的陣營，對他們來說或許是一個難以接受的封號。

卡普蘭（Morton Kaplan）可說是科學主義風潮的代表人物，在其 1957 年《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7*）中，提出其著名的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六模型（models）和五組變數<sup>6</sup>，認為這是一個在邏輯上協調一致、經得起經驗事實檢驗，以及具可操作性的國際關係理論。同時期的重要學者還有杜意奇（Karl Deutsch, 1912-92）的交流理論（communication theory），利用量化研究、系統分析和模型等，將國家間各行為者的社會、經濟、文化及政治上的交流關係和頻率予以量化，作為評估國家間整合程度的依據，在整合研究的論述上自成一家之言。行為主義在卡普蘭、杜意奇及其他學者對於科學研究方法的要求下，在 1950 至 1960 年代引起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變革，強調計量方法和模型的建構，以及跨學科領域研究方法的借用，包括體系論、博奕論與經濟學等。

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科學化」發展，霍夫曼（Stanley Hoffman）、布爾（Hedley Bull）與摩根索等學者陸續提出批評。霍夫曼最早反對國關研究套用數學和經濟學模式，因為光是變項的設定本身就富有爭議性（Hoffman, 1959: 347-77）。布爾的批評更為猛烈，反對行為主義者自認為是「真正的科學」，而忽略傳統主義的價值。同時，過於在方法論上爭議會模糊國關研究的焦點，如果人們試圖把其限定在嚴格的科學定義下，那麼對於需要邏輯或哲學論證的國際關係學門來說是有害的（Bull, 1966: 83-88）。而摩根索也否認國關理論有預測力的可能性，行為主義者研究無法符合所謂的「完全客觀」要求，因此不可能達到絕對的「真理」

---

<sup>6</sup> 此六模型包括：均勢系統、鬆散的兩極系統、緊密的兩極系統、全球國際系統、階級性系統和單位否決系統；而五項變數則為：基本的規則、系統轉換的規則、行為者、能力和資訊傳遞。

( Morgenthau, 1974: 21 )。

偏向行為主義研究的學者對於這樣的批評當然非常不滿意<sup>7</sup>，他們主張爲了使國際關係理論能夠比較和歸類，科學化的發展是一種必要。或許行為主義還不夠客觀周延，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國際理論科學化的目標是有可能達成的 ( Singer, 1969: 95-97 )。

## 二、密特蘭尼的立場

功能主義在這波關於研究方法的辯論中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許多批評者使用案例和量化標準來檢視功能主義，認爲以行為主義的標準來看，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只是提出一個「研究途徑」，而非完整的理論 ( Groom, 1975: 1 )。功能主義最大問題在於概念不夠明確，因此需要將其賦予可操作化的定義，否則有效性將受到嚴重的質疑。對於這樣的批判，密特蘭尼的立場非常明確：

更加地科學化有這麼一個風險：更少的相關性 ( relevance )。科學是建立在一連續的整體之上，適用於某些領域。然而國際關係領域卻是充滿不連續的亂流和不可預測的事件，那些將國際關係「修正」的勇敢嘗試，反而使國際關係更加的不科學 ( Mitrany, 1975: 29 )。

密特蘭尼認爲行為主義所秉持的客觀性、量化研究、模型化，嘗試將「人」的不確定因素排除，對於科學和方法論的過度追求，容易陷入爲理論而理論的盲點之中，而忽略了國際關係研究應有的價值 ( Mitrany, 1975: 29 )。密特蘭尼認爲學者應該花費更多的精力讓「世界社會」成爲可能，藉由日常的交流解決國家間的對立和差異，而非在研究方法與名詞解釋上爭論 ( Mitrany, 1975: 26 )。他對國際研究一味地追求研究方法上的「科學法則」，感到非常困惑：

---

<sup>7</sup> 如以科學化自許，研究「聯盟與戰爭」著名的學者辛格 ( David Singer ) 在 1969 年的文章中甚至以「非常強烈」的口氣回應布爾的 7 點批評，見 Singer ( 1969: 89-107 )。

學者們為了建立國際系統理論，戮力於採用科學的方法與精巧的工具，使政策執行者為之訝異，這樣的發展過去在國際關係確實是不曾有過。但是方法論上的發展並沒有就此沉澱出（precipitate）一塊堅固的基礎，因為它們使用的語言、模型和理解的方法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沒有證據表明，政策執行者的決策或政治行動的展開是立基於這些「科學模型」（scientific model）（Mitrany, 1975: 28）。

對於批判功能主義缺乏預測性這點，密特蘭尼認為為了使「預測性」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成為可能，學者大量借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是可以理解的，但經濟學家所做的大量數理化研究及預測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假設一個近乎在真空環境中運作的「市場」，在此市場中賺取最大利潤是每個行為者的目標。但是密特蘭尼認為國際關係理論並不是這麼回事，光是國際關係中「行為者」有哪些就已爭論不休，更遑論能清楚理解行為者的目標（Mitrany, 1975: 29）。國際關係理論無法達到科學主義下的預測性要求，因為沒有像經濟學如此純粹的假設環境存在。

## 伍、新功能主義的修正與密特蘭尼的回應

### 一、新功能主義對功能主義的修正

1950年由莫內（Jean Monnet）起草，而法國外交部長舒曼（Robert Schuman）宣布的宣言（*The Schuman Declaration*），是歐洲邁向合作的開始。1951年歐洲煤鋼組織成立，儘管莫內的目的是歐洲的「聯邦」，但主張以不挑戰國家主權的方式，建立國家之間的「功能性」聯繫，被視為是功能主義實踐的一個範例<sup>8</sup>。然而歐洲合作並非一帆風順，1965年戴高樂（Charles

<sup>8</sup> 一般認為『舒曼宣言』較符合功能主義的論述。見 Holbraad (2003: 51-54) 或劉豔 (2005: 69-72)。但 R. J. Harrison 認為歐洲煤鋼組織的概念較接近新功能主義，因為『舒曼宣言』

de Gaulle)以「空椅外交」抗議歐洲共同體議事規則的改變<sup>9</sup>，1973年和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以及1980年代歐洲高失業率、低成長率的「歐洲僵化」(euro sclerosis)，使歐洲合作在發展與停滯間輪動。歐洲的整合進程促使學者不斷思考，如何能更精確地解釋這一連串歷史事件的發展。此時，在行為主義風潮當中功能主義亦受到質疑，常被批評作為一個合作架構或許有其創意，但是流於描述性和空泛，在施行時就顯得問題重重。針對這樣的不足，哈斯(Ernst Haas)將功能主義加以修正，降低其規範的成分使之更符合科學化的要求，提出所謂的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以為因應，希望能夠解釋和預測歐洲的整合過程(Hass, 1964: 1-5)。

對哈斯來說，「共同需要」的假設或許是功能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所在。密特蘭尼預設了一個普世的、共善(common good)的狀態(Hass, 1964: 31-35)，此暗示人們有齊一的認知存在，了解到進行跨國合作才能滿足共同的需求，因此必須拋棄現有的國家制度，建立功能性的國際組織，邁向一個共同的美好未來。哈斯認為國家間合作的開始並不是從功能主義所說的「共同需要」開始，這概念太含糊也太難辨識，到底由誰來決定「共同需要」的內容？共善的狀態又是指怎樣的狀態？哈斯認為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才是整合的開始及關鍵，歐洲煤鋼組織和歐洲共同體都是符合各國經濟利益而產生的國際性組織(Hass, 1964: 47-50)。同時，利益受外在結構的限制，因個人認知而有所不同，彼此帶有競爭性，因此沒有所謂的「共同需要」或「普世利益」，只有外在環境結構制約下形成的各種不同個人或團體利益(Hass, 1964: 33)。

此外，哈斯還批判功能主義的四個「分離命題」(separability

---

目的在「建立聯邦」，這是密特蘭尼所大力反對的，因此在目標上『舒曼宣言』反而比較接近哈斯新功能主義。見 Harrison (1969)。但這樣的看法也是有爭議的，如 Desmond Dinan 就認為莫內和舒曼的作法不過是權力政治的考量，和功能主義或新功能主義沒有特別的關係，只是以流行的口號為掩飾，見 Dinan (1994)。

<sup>9</sup> 1965年法國總統戴高樂為了抗拒歐洲共同體的投票制度從一致決變成多數決，不派出任何代表參加歐洲共同體的會議，使代表法國的座位空空癱瘓議事，迫使歐洲共同體其他成員國讓步。



proposition)，此包括：(1) 將政治與福利分離：認為合作可以撇開高階政治的權力問題，而專注於低階政治的經濟問題。(2) 將政府任務分離成權力面向（如武力防禦）和福利面向（如經濟議題）。(3) 將專家與政府官員分離：在合作過程中著重技術性的專家，而忽略政府官員的態度往往才是合作的關鍵。(4) 將人們對國家與國際組織的忠誠分離成對立的選擇（Hass, 1964: 21-22）<sup>10</sup>。相較於功能主義的「分離命題」，哈斯將政治因素納入新功能主義的論述中，認為各國政治菁英或政府官員藉由界定共同的利益，可先從低階的經濟議題開始合作，而曾經在此合作中獲得好處的個人及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基於利益的考量將會支持其他領域的進一步整合。政治菁英們也會藉由這樣的過程，再修正對利益的認知和調適彼此的衝突，經過不斷的協調和實際利益的獲得，會產生進一步合作的期望，進而促使國家間邁向政治領域的合作。同時，不同國家的政治菁英、政府官員或其他參與者，經由這樣的功能性合作會將他們的忠誠轉移到另一個更大的制度中心（institution center），此即新功能主義的外溢（spill-over）過程（Hass, 1964: 372）。

總之，功能主義的分枝論是基於「共同需要」的存在，而使國家「自動」朝向跨國的功能性合作<sup>11</sup>，繼而使國際組織發展並建立超國家體制，其形式是隨功能需要而決定的（form follows function）全球功能性組織。相對地，新功能主義的外溢論則是出於「自利」，對於利益的自覺使人們意識到合作的好處，目標是一個超國家、區域性、功能性的制度中心，甚至不排除組成聯邦的可能<sup>12</sup>。哈斯認為區域組織較有整合的潛力，全球性的組織

<sup>10</sup> 必須強調的是此分離命題是哈斯對功能主義的認知，John Eastby 認為哈斯從根本上誤解了功能主義，見 Eastby (1985: 87)。

<sup>11</sup> 哈斯將功能主義的「自動產生的改變」分成三類：一是系統性的，代表國家由於能力不足而被迫的適應。二是辯證性的（dialectical），國家的排外性與功能性合作相衝突，達到更高階段整合的境界。三則是學習性的，參與國際組織的個人藉由學習自動改變其對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態度，哈斯並不排斥第三點。見 Haas (1964: 12)。

<sup>12</sup> 此「功能性聯邦」不同於以憲法促成歐洲整合的聯邦主義者的「聯邦」，雖然目標相近，但是過程不同。另外必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新功能主義者都如哈斯對歐洲聯邦的可能

相較於區域組織，因為含有更多不同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利益的衝突，合作的難度必定會增加許多 (Hass, 1964: 33)。

在前面的第二節提過，功能主義受多元主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抗一元論的主權國家觀點。由於對國家的不信任，功能主義期待限縮國家主權的絕對性與排他性，使國家僅成爲一個服務人民的機構即可。比較之下，新功能主義將政府機關也視爲利益團體，認爲在多元社會下基於不同利益所組成的團體（包括國家），將會取得一個自動的社會平衡（social equilibrium）(Eastby, 1985: 95)。可以說，功能主義的國際社會概念是福利取向，強調基於需要的滿足而進行合作；而新功能主義的國際社會則是強調多元主義的競爭面向，及以利益爲出發點的合作模式。

表 1：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的異同比較

|              | 功能主義            | 新功能主義        |
|--------------|-----------------|--------------|
| 合作的動機        | 需要的滿足           | 利益的追求        |
| 合作的進展        | 自動的、辯證的與學習的     | 對利益的自覺       |
| 主要的行爲者       | 人民與技術專家         | 政治菁英         |
| 對國家的態度       | 敵意，強調國家的不足      | 不排斥區域國家的可能   |
| 國際社會內涵       | 福利合作            | 多元競爭         |
| 最終的目標        | 全球功能性組織與世界社會的形成 | 區域、功能性的超國家組織 |
| 同樣強調認同與忠誠的轉移 |                 |              |
| 同樣強調合作的「過程」  |                 |              |
| 同爲漸進式的進步史觀   |                 |              |
| 同樣強調主權的共享    |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新功能主義在哈斯及其他學者的努力下雖然內涵益加完備，但對試圖解釋和預測歐洲整合的哈斯來說卻充滿挫折。歐洲整合是一個在發展與停

抱持開放的態度。哈斯之後的重要新功能主義者 Philippe Schmitter 對歐洲聯邦就採質疑並反對的態度，他的立場反而接近密特蘭尼。見 Schmitter (2000: 15)。

滯間輪動的過程，每一次的停滯期無疑都給哈斯的新功能主義帶來莫大的打擊，在 1975 年《過時的區域整合理論》（*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一書中，哈斯公開表示新功能主義雖未完全消亡，但已過時，甚至是個「明顯的錯誤」<sup>13</sup>。該如何解釋歐洲整合過程中這種走走停停的現象，是往後整合理論必須面對的課題。

## 二、密特蘭尼的回應

密特蘭尼對於歐洲整合一向持保留的態度，認為歐洲共同體（EEC）內含的區域思維，在往整合的發展過程中對於其他區域有著明顯地排他性（Mitrany, 1965: 119-49）。同時，科學化的要求使哈斯將功能主義原有的「共同需要」概念抽離，代之以可預測且範圍明確的「利益」，如此卻可能換來對經濟整合的過度強調，而忽略其他議題合作的可能性討論（Eastby, 1985: 109-11）。

另外，密特蘭尼對於新功能主義不僅解釋，並且促進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說法，更是直接的批判：

那些「科學的」區域整合主義者，將他們對歐盟發展的過程經驗，以及所聞所見置入他們的理論模型當中，以求一個通則上的解釋。實際上並不是他們的理論工作指導了區域整合的過程和具體形式，而是整合的進展給了他們理論上的靈感（Mitrany, 1975: 34）。

密特蘭尼亦認為哈斯誤解了功能主義，尤其是他對「分離命題」的批判，事實上功能主義從未忽略政治層面的重要性。密特蘭尼認為國家參與合作本身就是個政治行動，並且承認國家是目前最有能力因應當下問題，將內部資源統一管理，依照人民需要作最適當分配的政治組織（Mitrany,

---

<sup>13</sup> 關於早期新功能主義者的自我評估參見 Lindberg 與 Scheingold（1971）及 Haas（1975）。另外有學者認為歐洲整合出現停滯期不能成為否定功能主義或新功能主義價值的理由，再加上新功能主義在哈斯的學生林伯格（Leon Lindberg）和奈伊（Joseph Nye）等人的補充修正之下，新功能主義並未失去其在整合理論中的重要性。見 Mutimer（1994: 36-42）。

1975: 36-37)。沒有人可以避開國家的影響，只是在國際情勢演變之下，國家可能會漸漸成爲一個過時的機制，而不能滿足人們所需，屆時就「應該」想辦法將之取代 ( Mitrany, 1948: 358-59)。

## 陸、結論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國關理論在實踐或理論層面上的可能啓示包括：

首先，密特蘭尼思考如何防止戰爭，促進國際合作以及最終形成世界社會，都是從滿足個人的需要作爲出發點。對人的生存關懷和對人的價值尊重是功能主義的核心，而不單是爲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或政治整合。因此，其思想就不會是主流國關研究常見的「國家中心論」思維方式，也不能簡單地歸爲經濟合作分析的自由主義國關理論。

其次，密特蘭尼對於區域組織或區域主義是持保留態度，因其可能具有排他性，頂多只能做爲一種過渡形式。密特蘭尼期待的是由功能性組織所形成的國際社會，最終出現能夠滿足全體人類基本需要的世界社會。當然，密特蘭尼對於「國際社會」或「世界社會」的具體內涵，以及國際社會如何轉化爲世界社會，並沒有交代得很清楚。這或許和其強調實踐，反對抽象理論建構的實用主義思想有關。

再次，由於以個人需要而非國家利益作爲分析的基本層次問題，功能主義能夠跳脫康德主張實施類似共和體制國家間才能達成合作或和平的侷限。密特蘭尼認爲，不論是何種憲政體制的國家都同樣須滿足國內人民的需要，因此應該攜手合作以爲因應。這種想法和近來美國外交政策常以「民主」或「人權」作爲經濟交往合作的前提，形成鮮明的對比。

最後，密特蘭尼持有實用主義的思想方法，因而主張所有的政治理論，包括國際關係研究，都必須是「問題解決取向 (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的，理論是爲了去解決問題，而不應該爲了理論而理論。然而，這和主流

國關理論的（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不同，後者主要是思考如何解決國際體系失序的問題，如霸權穩定論或國際體制論，而功能主義關心的是如何滿足個人的物質和心理需要。此外，密特蘭尼的功能主義是採行一種進步史觀，因此拒絕國際關係是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循環史觀假設，強調人的能動性與理性可以追求世界社會的實現。

毫無疑問，密特蘭尼的理論仍有不明之處，例如其一方面反對排他的絕對主權觀，另一方面又主張加強政府的權力以回應人民的基本需要，主權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到底為何？另外，如何保證功能性國際組織能公平地滿足所有人們的共同需要，如何保證過程沒有權力支配的宰制問題？這些都有待進一步釐清。

本文主要是透過比較的方式，來理解密特蘭尼國際關係「理論」的立場與特色，而非企圖重新詮釋其功能主義的「思想」，以替密特蘭尼的學術地位翻案。雖然本文第二節已稍作處理，將來如有機會更深入探討功能主義思想和當時英國思潮，如多元主義、實用主義和費邊主義，之間的關聯性，或許會有另一層的學術研究收穫。

## 參考書目

- 徐火炎。1976。《多元主義與民主政治——被俘虜的政府與民眾》。台北：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 張世雄。1996。《社會福利的理念與社會安全制度》。台北：唐山。
- 詹姆斯。陳羽綸、孫瑞禾譯。1981。《實用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艷。2005。〈讓·莫內歐洲一體化思想探源〉《湖南師範學院學報》27 卷 5 期，頁 69-73。
- Bull, Hedley. 1966.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J.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3-88.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Carr, E. H. 1939.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Carr, E. H. 1942. *Conditions of Peace*. London: Macmillan.
- Carr, E. H. 1990. *What is Hist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 Dinan, Desmond. 1994. *Ever Closer Un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Eastby, John Hiatt. 1985. *David Mitrany's Approach to Politics: Function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Groom, A. J. R., and Paul Taylor, eds. 1975. *Func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rane, Russak & Company.
- Haas, B. Ernst. 1964.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as, B. Ernst. 1975. *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Berk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Hammarlund, Per A. 2005.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The Thought Of Richard Cobden, David Mitrany, And Kenichi Ohma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arrison, Reginald J. 1969. "Neofunctionalism," in Groom, A. J. R., and Paul Taylor eds., *Functionalism*. Final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Bellagio, November 20-24.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Hoffman, Stanley. 195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Long Road to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11, No. 3, pp. 346-77.

- Holbraad, Carsten. 2003.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ant, I. 1957 [1795]. *Perpetual Peace*, ed. by Lewis White Beck. New York: Macmillan.
- Keohane, Robert. 1978. "Book Review: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2, No. 2, pp. 805-806.
- Lindberg, Leon N., and Stuart A. Scheingold, eds. 1971.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trany, David. 1933.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London: Allen & Unwin.
- Mitrany, David. 1948.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World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3, pp. 350-63.
- Mitrany, David. 1965. "The Prospect of Integration: Federal or Functional."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 No. 2, pp. 119-49.
- Mitrany, David. 1966. *A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 Mitrany, David. 1975.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 Morgenthau, Hans J. 1966. "Introduction," in David Mitrany, ed. *A Working Peace System*, pp. 1-11.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 Morgenthau, Hans J. 1974. *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utimer, D. 1994. "Theory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 Soldatos,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pp. 13-42.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Navari, Cornelia. 1995. "David Mitrany and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ism," in D. Long, and Panayotis Wilson, eds. *Thinker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Inter-War Idealism Reassessed*, pp. 214-4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osamond, Ben. 2000.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chmitter, Philippe C. 2000. *How to Democratize the Emerging Euro-Polity: Citizenship, Representation, Decision-Making*. Boulder, Colo.: Rowman & Littlefield.
- Singer, John D. 1969. "The Incomplete Theorist: Insight without Evidence," in J.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9-107.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Taylor, Paul, ed. 1983. *The Limi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Croom Helm.

Taylor, Paul. 1990. "Functionalism: The Theory of David Mitrany," in A. J. R. Groom, and Paul Taylor, eds.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p. 135-65. London: Printer.

Vasquez, John. A., ed. 1990.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Wilson, Peter. 2000. *E. H. Carr: The Revolutionist's Realist*.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ilson, Woodrow. 1917. "War Message." ([http://www.milestonedocuments.com/document\\_detail.php?id=76&more=fulltext](http://www.milestonedocuments.com/document_detail.php?id=76&more=fulltext)) (2010).



# David Mitrany's Functionalis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Yi-ren Dze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Cheng-jung Wu

*M. A.,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 Abstract

It is misfortune that David Mitrany's functionalism is often simplified to be a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by some peoples without probing into his core of ideas.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are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goal and methodology of functionalism, and to review some critics with bias made by some scholars. Besides, we can know functionalism deeper by examining Mitrany's position in two Great Debat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functionalism will be compared with Wilson's idealism, Carr's realism and Hass's neo-functionalism.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of functionalism in today's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David Mitrany, functionalism,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